

GAOCENGRENWUZISHU

高层人物



自述

中国古籍出版社

高层人物自述

主编 孙小金

第四卷

中国古籍出版社

在中央苏区 1933—1934

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在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全体成员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又一次讨论了形势。尤尔特同志特别嘱咐我，要在党政军领导中有争论的势力之间做些和解工作，他还向我暗示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过去的冲突，他认为这些冲突尚未解决。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也都一一表示了他们的愿望。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我从这些指示和建议中感觉到，他深信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并且抱有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设想。因此他命令我，尽快让人建立一个飞机场，并在赣江和盱江之间的北线上建立坚固的阵地，以便在那里能以薄弱的力量牵制住敌人，在福建战役结束之后就着手准备一次大规模进攻，目的是一直挺进到南昌，或者甚至挺进到长江沿岸的敌人中心地区。虽然我上面所概述的军事形势的突变还没有发生，因而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突变的情况，但是我对这些计划表示了怀疑。他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为了保证在危急情况下能够直接联系，他同我商定了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尤尔特同志稍稍劝阻了一下，他说，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

半夜，我带着几百块美元，以应付意外情况，和一只小手提箱，乘车来到码头，在那里上了一只英国海轮，上这只船的好处是不会有提什么好奇的问题。为谨慎起见，我还是弄来了一张国内护照，护照上填写的地方，当然不包括那些“防匪地区”。海轮把我带到汕头，在这个华南港口的唯一的一家欧洲旅馆中，我根据约定见到了中国的联络员，他是保卫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姓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曾在基督教教会学校读过书，在冯玉祥军队中担任过牧师，后来成了共产党员。这里附带说一下，1937年我在延安又见到了他，当时他在中央新闻部门当翻译，另外还担负一些保卫和联络任务，例如1936年在西安他给埃德加·斯诺同邓发接上了关系。

第二天早晨，王拿着我的小箱子（到了瑞金我又把这只箱子取了回来，里面的东西完好无缺），这样，如果我们在路上被截住，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无辜的旅游者。接着我们一起乘车向内地行驶，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潮安的那一边就是“禁区”了。我们步行离开城市，向韩江河畔走去，还没到达河畔，突然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截住。一名军官检查我的护照，检查了好久，最后还是让我们走了。王对军官说，我是考古学家，想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

以后没有再遇到其他意外情况，我们到达了韩江。另一个联络员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使我很失望的是他不懂外文。后来我多次见到他，1935年长征途中，在一次蛮子

的突然袭击中，他牺牲了。王匆匆与我告别，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拖着，向上游驶去。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我的下面是流水的声音。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的源流上缓缓前进。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潜入了一间偏僻的房子。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着毛瑟枪的人，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战士。

我们仍然在国民党地区。第二天夜晚，我们又动身了。我们在稻田中间狭窄的田埂上鱼贯而行，绕过极其昏暗的村庄的屋角和篱笆，走进了山区。突然在我们前面传来了枪声，我们的侦察员同国民党的巡逻兵遭遇了，我们不得不折转回来。第二个夜晚，我们比较幸运，到天亮时已走了好大一截路程。白天我们睡在亚热带树林里，成群的蚊虫蜂拥而来。过了两夜到达了无人地区，一营地方部队在等着我们。我们继续翻山越岭，在白天行动。一眼望去，到处是淤塞的稻田，野草丛生的薯地，荒芜的蔗田，烧成废墟的房屋。四周几乎杳无人烟，这是长年内战的后果。

又是上山，一直爬到山顶，我们越过了福建和江西两省的交界线。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幅完全不同的、使人愉快得多的情景。我们下了山，走上一片宽阔的肥沃的平原，这里有收割过的田地、干净的房子和勤劳的人们。

在整个旅途，我象是一个聋哑人。我学会的几句支离破碎的中国话，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会讲的是中国官话，也就是北京方言，而我的同伴们讲的都是广东或福建方言。旅途中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毛巾，警卫员们簇拥在我的四周，把所有好奇的人挥走。就这样，我们到了红色首都瑞金。那时瑞金几乎已经被国民党飞机全炸毁了。我们在远离城市废墟的一间冷落的小屋子里停下来了，等了几个小时，来了一个比较消瘦的中年人，满面红光，身后跟着一队警卫人员。

这就是邓发，他是中央委员，又是党和政府的保卫委员。第二年我对他的了解多了起来。他是一个性格诙谐、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人；他喜欢举行赛马和手枪射击活动，用宽面的大刀装备他领导下的保卫部队和警卫人员，刀把上绑着红布。就我所能判断的情况来看，他严格地并且“不偏不倚”地履行他的职责，而不公开介入内部的纠纷。1946年4月，他同博古和叶挺一起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邓发讲了几句不成句的俄语，向我表示欢迎，陪我走进一间孤独的农舍。那里接待我的是两个俄语说得非常好的同志，他们自我介绍说是我的翻译。两个人都在苏联学习过，其中一个伍修权。在我所参加的政治局和常委会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都是他为我翻译，我认为他翻译得完全正确。1935年他被任命担任外事工作，得到毛的信任，逐渐升为中央委员，中央国际联络部领导和外交部副部长。我同他最后一次谈话，是1939年秋天，是在兰州当我乘飞机回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那里领导党和政府外事处的工作，担任苏联基地司令员的联络员。1963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从远处看到他，听到他粗暴地攻击兄弟党，因此代表们不得不命令他遵守大会

秩序。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搞得声名狼藉。1967年4月13日，我见到了一张北京“红卫兵”大字报的英文底稿，大字报指控他“反对毛的革命路线，反对林彪，亲近南斯拉夫和苏联修正主义，攻击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大字报上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在1935年1月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上，正是李德这个大叛徒，最激烈地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方针。李德在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都是反对毛主席的，而把李德的这些报告和讲话忠实地翻译过来的不是别人，就是伍修权这个混蛋。”

另外一个翻译是一个很壮实的中国北方人，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有扎实的军事知识，主要从事训练工作，在军事学院为我当翻译。在延安抗大——这是一所抗日干部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后军事学院就叫抗大，我们也一起工作，一直到我离开。

我周围还有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带着毛瑟枪和大刀担任警卫。

当天晚上，博古和洛甫来看我，他们告诉我，我的住处在一个禁区内，所有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参谋部，都设在这个禁区内。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办公室，离我的住处步行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国民党飞机早就发现了这个地区，几乎每天都来轰炸。我们看到，到处都是防空洞和防空壕，当五百公斤，一千公斤的重型定时炸弹扔下来时，这些防空洞和防空壕也只能起到相对的保护作用。所以我们以后就不得不迁到离瑞金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住在禁区内的居民完全可以自由行动，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不知疲倦地劳动着。他们忙着收藏这一年的第二季收成，把稻子、甘薯和腌菜集中起来，甚至还交纳猪和鸡，为红军战士编树皮鞋和草鞋，用外地的棉布缝制制服。

博古和洛甫向我简略地介绍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地方再谈，这里我只想讲一个与当时军事发展有关的问题。他们两人对福建战役的胜利都表示满意，那时已是十月中旬，这次战役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他们暗示，有可能同蔡廷锴取得谅解，后来到十月底果真实现了。他们对赣东北的局势显得很担忧，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恶讯。他们根据这个消息，尖锐地批评了东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的作为。肖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惶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认为在苏区业已巩固、敌人进行堡垒战的新条件下，这种过时的方法必然会导致战略重点、甚至大片地区无法挽救的损失。他们说，1933年初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的闽西区党委书记罗明以及这个区的其他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在一次国民党部队（其中包括不久前刚调到那里去的第十九路军）的进攻中，也是逃跑似地慌忙撤退，当时所失去的各县一直到现在才得以收复。同时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肖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我把博古的劝告牢牢记在心上。更使我惊奇的是，不久以后，在十二月，周恩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反对红军中以肖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在这篇文章中周指出，在红军中，特别是在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中，这条路线根深蒂固，同这条路线的斗争，如同以前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一样，是我们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毛泽东却相反，他亲自出来袒护肖劲光，因为肖劲光是他的比较亲近的同乡，在1930年毛的政治阴谋中又多少有点瓜葛。后来，毛甚至不惜把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以博古为首的党的领导，随心所欲地时而说它是“左”倾机会主义，时而说它是右倾机会主义。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我们还完全一致地明确规定，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任何干涉。因此，我在以后的时期内只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当然这样的会议也是相当多的。

博古和洛甫还告诉我，在瑞金只有他们两人是中央书记，他们的分工是，博古承担党和军队的工作，洛甫负责政府和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但是看来他们不久都得到了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后果。博古越来越成为一心想获得原有权力地位的毛泽东的攻击目标，而洛甫在政府中与毛紧密合作，在毛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他的立场。不过，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地步，这两个中央书记暂时还是同心协力的。

最后，博古要我暂时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认为，我是个“外国鬼子”，为了我的安全，又鉴于国民党不断叫嚷有“俄国间谍”活动，这是必要的。对此我虽然不很了然，但还是顺从了。再说，几天以后我的脚发炎了，肿得不象样子，而且全溃烂了。医生对我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热带病，是由沼泽中的污水和蚊虫引起的。因此我有一个半月或多或少的被拴在房间里了。

这次谈话后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项英、刘伯承和另外二、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其中有青年团书记。三个有名的委员没有出席，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王稼祥在1932年被弹片打成重伤，住在野战医院，他是政治局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整年都很少见到他。

会议主席是毛泽东或项英，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对1932—1933年冬季北线上的成功反攻讲了几句赞许的话。他似乎知道，这次反攻是我建议的，由此得出结论，我是同意他的观点的，他的观点是，必须以速决战，切断敌人的内外联系，以此打击敌人。然后讨论了群众动员和供应问题。接着项英作了一个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报告说，整个中央红军已出发开往北线。有人问我，对以后的兵力部署如何设想。我想到弗雷德的指示，就建议，通过地方武装，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盱江之间，并且如一年前所计划的那样，把五军团（一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五个师）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叙述这一次讨论的过程，因为以后对形势的判断和作出的决议似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的。博古以及以后的周恩来，总是习惯地把一切军事问题事先同我讨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这种情况看来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两人专门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

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当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毛却巧妙地利用这种误解以便撤去博古党的总书记的职位。

根据我在以后几星期和几个月中进一步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央苏区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总的来说是有充分准备的。然而，中央苏区的外部形势是困难的，同二军团、四军团以及红十军的联系被切断，同六军团和十六师的联系也中断了多时，因此同这些部队的协同作战就完全不可能了。除了事实上已经可以说是解散了的十六师而外，这些部队虽然都保住或恢复了它们的有生力量，四军团甚至还增加了有生力量，但是它们的苏维埃根据地就不得不被认为是全部或部分丢失了。此外还有以下一些不利的政治因素：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薄弱，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工作没有开展，以及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不够等等。

因此，中央苏区只得完全依靠自己了。苏区本来巩固的地区同样也在缩小，这同我们在上海时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前不久在福建收复的地区尚且不能说是已经牢固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而最近在赣东北被割去的地区当然就更不能这样说了。真正不受敌人威胁的巩固地区，估计得高些，大约有四万平方公里，我曾多次到前线各地进行过实地考察，这个数字是可以确信的。这块巩固地区以瑞金为中心向四周各延伸大概一百公里左右，向南大大少于一百公里；向北则多于一百公里，还有一块差不多大小的地区，虽然仍在苏维埃机构的管辖之下，但常常是有争议的或者是军事上的无人区。这里不断有红军的地方武装和敌人的地方部队，主要是民团和省军交错活动，一部分地区已经被敌人的堡垒体系割开了。

尽管如此，这个被敌人封锁和禁锢的地区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农产品可以足够养活本区居民以及部分红军；红军通过对国民党地区的袭击，不仅能满足武器和弹药的需要，而且还能满足粮食、服装等方面的需要，如最近在1933年夏秋两季的情况就是如此。此外，在闽南和粤北还进行着相当活跃的贸易，输出钨、烟草和其他产品，输入迫切需要的奇缺商品，特别是盐、棉布和煤油。

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建立以来，老百姓中的政治工作已经有所改进；1933年春，政治局直接领导以后，更有了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的结果不仅表现在公粮增多，红军服装及其他装备生产的提高，而且也表现在自愿要求参加红军的人大批增加。在此基础上，到1933年底建立了很多新的正规部队，例如：第三师（后来改称为九军团）、第六师（编入三军团）、独立十四师和独立十五师，这两个师主要是由共青团员组成，所以也称为青年共产国际师（后来合并成一个师，隶属于一军团）、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师（后来合并成七军团的一个师），以及独立二十二师和独立二十三师。根据总参谋部的资料，中央委员会当然不得不批评指出：在动员红军战士以及组成新部队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如地方苏维埃不是始终坚持自愿的原则，说服工作常常为行政措施所代替，因此逃兵的百分率很高，各地区的情况不一，逃兵的百分比大概占动员兵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建立新师的时候，对指挥部的成员——指挥员和政

委的挑选不够认真，对部队训练也很不重视。所以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老部队中“正常”减员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最后，由于建立了这么多新的部队，对原有部队减员的补充也暂时受到了影响。

然而正规部队还是增长到了四万多人，这些部队由于1933年的胜利都比以前有了较好的武器装备，特别是装备了机关枪，但重型武器仍然明显地感到缺乏。虽然有缴获来的迫击炮（确切地说，按当时的语言习惯应该称之为山炮，这种炮可以拆开用毛驴运输）和野战炮可供使用，但是缺少弹药。如果弹药用完，这些武器也就报废了。相反，步枪和机枪的子弹，却可以利用旧弹壳在自己的工厂里制造。有一个兵工厂，从1933年以来，就制造手榴弹和修理轻型步兵枪械，1934年就转为辅助生产迫击炮弹了。参谋部和部队都配备了足够的通讯工具，特别是无线电和长途电话。无线电不仅用于联络，也用于侦探，国民党司令部的很大一部分的消息和命令都是靠无线电窃听和破译的。总之，我们这些较高一级的参谋部，特别由于刘伯承的努力，还是比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但是在某些师和多数团里的参谋部的工作，往往只局限于附属性的辅助和抄写工作。后勤工作——卫生、供应、军队的补充等，如果考虑到当时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如医生和药材，那末还是完全符合需要的。由于生活条件和运输条件很差，随军人员中有很大一批担架队员、炊事员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辅助人员，成了战斗部队的累赘。

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上与苏联红军的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根据这个方案，一个师由三个步兵团、一个迫击炮部队（有迫击炮二至六门）、一个侦察连、一个通讯连和一个内勤连（警卫连）组成；一个团分成三个步兵营、一个机枪连，并各有一个侦察排、一个通讯排和一个内勤排；一个营分成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排和一个内勤排；每个连分成三个步兵排，每个排分成三个班，每个班有十名战士。一个师的应有兵力，类型不同，多少不一，在一、三军团是七千五百人，配有三千五百至四千支枪，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挺轻重机枪和四至六门迫击炮；在五、七和九军团中是七千人，配有三千至三千五百支枪、六十至九十挺机枪和二门迫击炮；在独立师中是六千五百人，配有三千支枪，四十至五十挺机枪。但实有兵力，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尤其是在独立师当中，通常都大大低于应有兵力，在某些师中，有时只有三千至四千人，甚至更少。我从广东前线向北前进时，在瑞金附近看到隐蔽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兵营里的五军团，那里的人数当时还不到五千人。

一般说来，新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所不利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条件下，一些排、班基层单位的力量比较薄弱。由于缺乏机枪和弹药，部队火力不足，又由于训练仓促，部队中没有作战经验的战士的比例过高。

这些不利的因素，通过1933—1934年在部队里以及在战俘中开展的良好政治工作，部分地得到了弥补，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成果：提高了部队内部的自觉纪律，建立了与老百姓的模范关系，促成了士气的空前高涨。我在中央苏区这一年中，只听到一件

破坏纪律的事，有两个化装成国民党士兵的侦察员，在敌人后方强奸了一个妇女，他们完成军事任务回来以后，就被军事法庭提审、处决了。我想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偶然事件。

此外，在部队的高级干部中，以及在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中，一直还存在着游击主义的残余。这不仅在上面提到的肖劲光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我在1933年12月第一次上北线所经历的一件事，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一次总参谋部任命一个指挥员去担任一个独立师的领导，但是这个指挥员立即到了前敌指挥部，表示拒绝接受这个师，坚决要求分到三军团去。这件事甚至还引起我同周恩来之间的一场小小的争论，周告诫我说，应该考虑到这些干部的心情。

为了提高部队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水平，1933年夏天我在上海就曾建议建立一所军事学院。当我到达瑞金时，它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只是初具规模。军事学院有将近一百名学生，都是有作战经验的低、中级指挥员，1934年一年中，人数增加到几百名。领导同志除了偶而来校作政治报告，很少关心这个军事学院，只有刘伯承和周恩来表示了比较大的兴趣。我的翻译很精于军事，我同他主要担任讲授战术课课程，主持讨论和作战演习。这些课程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因为直至我到那里时，所有的军事专业课完全由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讲授，其中有五十二师师长，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这名将领曾企图煽动他的旧属，1934年初又自杀未遂。之后，我应周恩来的恳求，同这个人谈了一次话。他说，训练共产党人去反对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他于心不忍。不久以后他失踪了，可能被枪毙了。

国民党军官讲授战术课，是以德国前线服役规程为基础，其中有《多种武器的使用与作战》。但我们没有重型武器，因而也不能进行经典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讲授这些课程是毫无意义的。我于是用了很大气力，编写了轻武器部队在运动战中的战术规程，使其既适合红军游击战争的传统，又符合同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的要求。然而，大部分国民党军官对此都没有兴趣。我们逐渐让那些最好的学生去当老师，把他们换了下来。只有一个年青的工兵少校例外，这位少校后来在长征途中，例如在黔东强渡乌江的桥头战役中，立了多次战功，以后入了党。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家休假，没有再回来。

最后我想谈一点关于红军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这方面我见到一个关于政治管理工作的报表，使我很受启发，当然这个报表所涉及的只是中央红军，而且所反映的也只是1934年夏天的状况。据报表介绍，中央红军百分之六十六是农民，百分之三十是工人，百分之四是其他成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报表是不可信的，因为它很明显是从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阶级划分出发的，这种错误的阶级划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把农村工人、苦力和流氓无产阶级分子都算是工人阶级。事实上，如果把工人阶级只是理解为产业工人，那末工人的百分比要低得多，而农民和其他成分的百分比要高得多。这从动员工作的统计中看得很清楚，统计表明，新兵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七是从苏区居民中征集的，百分之七是从战俘中招募的；百分之四是从起义过来的人当中补充的，百分之十二是过去的国民党部队的成员。所谓过去的国民党部队的成员，显然是指1927年以后由当时

的国民革命军的起义部队组成的红军的原有的骨干——或者是红军的残留部分。关于部队战士的年龄，情况要好一些：十六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一，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占百分之五十一，二十四岁到四十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四，四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四。红军中百分之二十八是共产党员，百分之十以上是共青团员，因此党员的人数从1932年到1934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如果算上共青团员，甚至增加了一倍。共产党员中百分之二十七是指挥员，百分之十是政治工作人员，百分之四十是红军战士，百分之二十三是参谋部和后勤机关的工作人员。

这个概述无论如何表明了，红军主要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它的这种性质在以后几年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但同时也表明了，红军无可争议地是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保证了它的高度的纪律和士气。甚至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极艰苦的环境中，红军也保持了这些特点。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与以前的一切计划完全不同，它是政治、警察和军事措施的综合。为了提高部队的可靠程度，巩固部队的纪律，蒋介石在所有部队中都设立了政训处，其成员主要是法西斯“蓝衣社”分子，同时加强了战地宪兵队。为了破坏占领区居民的反抗，他们采取了“联保”制度，并且在地方控制和管理方面，给予民团这一类反动的“自卫组织”以无限的权力。他们为了争取居民，还开展了“新生活”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平定国家、“医治”经济、重建因内战而遭到破坏的城市和乡村。但实际上，这一运动结合上述其他措施，不过是意味着向归的半封建状态的倒退。用来引诱农民的“改革”，其目的不过是要在消除过去债务奴役的沉重负担的幌子下，重新恢复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毁掉的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的地契和证券的法律效力。

所有这些措施，当然对老苏区居民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国民党部队里却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敌人在第五次“围剿”中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

新“围剿”计划的核心是德国顾问们根据第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炮制的一个完整的军事方案。它的基本思想是，集中几个主攻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在每一个主攻方向造成战役优势，而在进攻时则完全采用战术防御手段，也就是说在步步推进中布下一个越来越稠密的碉堡体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持久的、消耗巨大的行动，但是德国专家们认为，这一行动可能使而且必然使中央苏区在一、二年之内完全瓦解，并使残留下来的“岛屿”逐渐缩小。他们还断定，中央红军由于不得不进行堡垒战而越来越失去运动的自由，并逐渐被消耗，最后被包围，被消灭。

这方面的前提，从军事上看确实是存在的。帝国主义列强所提供的比1932年更为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贷款，至少可以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队按照现代化的原则重新装备和改组。德国以及其他外国顾问，主管训练国民党部队掌握新式重型武器，并在主要战线上负责兵力的调动。由于建造了公路和混凝土工事，后方和补给线的安全也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在这个基础上，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配备了不下四十个师的兵力进攻中央苏区，而对付其他根据地和红军其他部队的任务，则大部留给各省的部队了。蒋介石只是

在每一条战线上为各省部队配备了二至三个他自己的师，借以加强各省部队。此外，对付中央苏区的还有十九路军的五个师、粤军的六至七个师，湘军的三至四个师，总共有五十至六十个师，将近五十万人，或者说其兵力高出我军十倍以上。

至于说到火力，那当然更是无法比较了。敌人的五百架飞机川流不息，轮番轰炸着前线 and 苏区后方，而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防空设施，最主要的防空办法，如同在陆战中一样，不过是到处都在熟练运用的伪装办法。估计敌人有一千五百门迫击炮和野战炮，而我们只有二十几门，就是这些炮又由于缺乏弹药多数已无法使用。机关枪的比例虽然不那么悬殊，但也至少是二十、三十比一，我们的主要武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步枪和手榴弹。

关于蒋介石的进军计划，我们得到了相当准确的情报。他计划了七个主攻方向，三个在北线，近期目标是占领永丰、广昌和建宁；西线首先攻打兴国；南线攻打会昌，东线攻打长汀和宁化。在这七个主攻方向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有三至四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苏区进军。此外，东北线还有陈诚部队的十至十二个精锐师，准备随时参加任何一条战线的进攻。余下的十至十五个师驻扎在碉堡里，从那里掩护进攻的部队，而自己并不出击。

可以看出，这个进攻计划的目的在于，在上述的七个主攻方向上把堡垒象楔子一样插进苏区的核心，先把中间地区分割开来，然后逐个加以“清剿”。这完全符合蒋介石和他的顾问们的基本战略思想。

幸好敌人同时的集中进攻未能实现。湘军和粤军开始采取观望态度，而十九路军则完全离开了进攻的行列。采取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争夺。这些冲突和争夺使我们有可能“利用敌人阵营的政治矛盾”，把主要兵力集中于北部一线，打垮敌人军事上的咄咄逼人的优势。因此，比较大的战役主要都局限在北线。

从一开始敌人就坚持以守为攻的策略，前进时，总有飞机和大炮进行火力掩护，即使没有遇到抵抗，前进四、五里（二公里）以后，就掘壕自卫。敌人在所有的通道和一切村镇上都构筑了“堡垒”，堡垒之间可以互相了望，机枪火力可以彼此接应。这些堡垒用我们的轻武器根本无法攻占，敌人从这些堡垒中出来，至多离开一小段距离，一旦遇到我们的反攻，就马上折转回去。附带说明一下，红军战士有时轻蔑地称之为“乌龟壳战术”的敌人的堡垒战术，并不是什么新的进攻方法。这种战术在前几年就已经运用了，在这几年中对中央苏区形成了一道或多或少无法通过的封锁线。堡垒体系构筑最坚固、推进最深的是北部，它的前端从赣江延伸到永丰以北、乐安和南丰以南、直至黎川，其主要部分是从福州到南丰两岸都构筑了坚固堡垒的盱江一段。西部主要的堡垒线沿赣江到赣州，从赣州继续向南到信丰以北和会昌以南，一直到福建边界。东部，即闽西，堡垒一直没有构筑完毕；1933年我们发动了夏季攻势以后，这些堡垒大部分都被放弃或捣毁了。在东北部暂时还敞开着缺口，敌人准备在拿下黎川以后，继续构筑堡垒，越过尚在我们手中的广昌和建宁直到南丰，来封住这个缺口。

中央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以坚决的措施回答了蒋介石的战略计划。他们用“一切为了前线！”和“不丧失寸土！”等口号来动员群众，特别是他们成功地使

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产品和输入的商品进行公平的分配，同时还进一步采取了尽可能完全自给自足的方针。接着掀起了一场新的动员参军运动，这场运动在1934年持续了整整一年之久，并于年中达到了高潮。按照官方数字，自愿参军的有将近十万人。据我估计，其中最多只有六万人补充了正规部队，其余的有的当了逃兵，有的不合格，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退了回来，或者被分配在地方自卫部队。但是，参军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就足以弥补第五次反“围剿”一年艰苦斗争中的损失，并可以有一定的储备。

中央红军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从1933年10月到12月底，在北线、主要是在东北一线作战。他们本来应当利用敌人的堡垒地带在那里尚未建成的这种情况，包围和进攻陈诚军队的外侧，而不是如弗雷德所建议的那样，一直挺进到浙皖敌人后方的中心地区，因为如果这样，就有被敌人切断退路、无法撤回的危险。

十月底，我第一、第三军团与陈诚的三至五个师展开了大规模的遭遇战。敌人虽然遭到重创，但未被歼灭，因为它们依仗着在此期间构筑了堡垒的黎川城，立即掘壕自卫，转为防御，使其优势火力充分发挥了作用。在这个地区后来又有两次遭遇战，战斗开始时我军取得了胜利，但结果不分胜负。

十一月份，第一、第三军团把作战重心从敌人有计划地构筑堡垒的东北部移到盱江两岸，以便在那里先发制人，进攻从南丰向广昌挺进的国民党主攻部队。那里发生了一系列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我们虽然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每当我们进攻时，敌人就退到碉堡里面，以火力掩护自己。不久，来增援主攻部队的陈诚主力，也是尽量回避任何决战。这几次战斗一般被称为浒湾战役（以盱江而得名，盱江又称浒江），它持续了一月之久，实际上成了我们这方面的分散的短促突击。

十二月，当陈诚在东北部又试图从黎川向建宁推进时，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情形。我第三、第五军团向陈发起进攻，但也只能把它打了回去。

因此在这三个月中，中央红军只得满足于取得一系列战术上的胜利，至于在大规模的包围战和开阔地野战中歼灭敌人，这个主要目的则没有达到。红军的攻势只好停止下来，但是敌人也没有达到其目的，它未能攻下广昌和建宁，然而却把堡垒体系从黎川一直延伸到闽西北的邵武。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第一阶段的战斗，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进行了审议。林彪指责说，在浒湾战役中，第一军团奉命利用初战成朱继续进攻。追赶敌人直至碉堡区，但退路却没有保障。彭德怀反对分散主力部队。他争辩说，如果在十二月战役中把第一军团放在黎川东南，也许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抓住了这些批评意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激烈反对这种战术，即：一旦敌人离开碉堡区，就箝制敌人于主要作战区内，给敌人以直接的反击。他认为，由于这种战术我们失去了主动性，自己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即在敌人的外部交通线上或在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能性。对于这种他称之为进攻性防御的原则，本来是无可争议的，我们大家也都是赞成的。但是面对敌人的“堡垒政策”，该如何实现运动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回答。在赣东

北敌人的外线寻找决战时机，这点从战略上来讲是毫无结果的。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如果敌人不这样做（最近三个月的经验证明，敌人连做梦也没想过要这样做），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些考虑同我对形势的判断是符合的，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认。

在这以前，大约在十一月底，博古和我走访了设在建宁的前敌指挥部。此行之目的，除了想同朱德和周恩来讨论军事战略与战术的问题而外，主要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前敌指挥部的合作中存在一些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就我们看来最主要的是要严格划分各自的职权范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前敌指挥部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行动，至少在中央红军的调动上是这样。前敌指挥部所依靠的是它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比较了解，因为只有它拥有利用无线电技术进行侦察的一切手段，以及通过特务和侦察员获得补充情报的一切力量。因此，作为军事委员会机关的总参谋部，实际上只是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领导机关，只是兵源补充、给养供应和战士训练的组织机构。最高军事领导如此分成两部分，使得一切军事行动很难一致，更促使游击主义现象产生，而且便于毛泽东挑起争端，从中渔利。

我们此次旅行（我一直不能步行，只能骑马）用了三天时间。半路上我们曾在几个兵站和一个野战医院过夜。这些兵站虽然比较简陋，但相当整齐；野战医院尽管设备很少，却完全符合卫生要求。从瑞金到建宁有一条战地军用电话线，我们逗留过的兵站和少数比较大的地方苏维埃政府都有电话相通。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张贴着竞赛图表，以激励人们去争取更大的成绩。总之，到处是一派充满着政治积极性的和平景象。只有一次，我们在射程以外从一个用岩石筑成的堡垒旁边走过，听说堡垒的洞穴里驻有一个地主的民团，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和水源，所以能坚守至今。

第三天晚上，我们到达建宁。朱德和周恩来在前敌指挥部会见了我们。他们领着我们穿过了指挥部。指挥部有十几间房子，包括警卫人员有几百人，其中有整整一连被亲热地称为“小鬼”的情报科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日夜值班，窃听和破译国民党的无线电报。在以后几天中，除了一些次要问题，例如改进后勤组织工作等等，我们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的关系以及总参谋部和前敌指挥部的关系问题。我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合并这两个机关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它们本来都是用同样的联络工具——军用电话和电台与部队取得联系，而且由于中心区离前线不远，亲自同部队指挥员联系，也不致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另一方面，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作为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红军总政委，在瑞金可以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这样，有关职权范围的一切含糊不清的问题就一下子都解决了。至于中央红军进行大规模战役的领导问题，可以根据需要由第一军团或第三军团总指挥林彪或彭德怀负责，如有必要也可以由军事委员会的某级领导负

责。这个决定由军事委员会批准以后，从1934年初开始实行。

六年以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在莫斯科宣称，我企图用这种手法免去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员职务。还说，毛泽东看穿了这个阴谋，激烈地反对了这种做法。凭空捏造、诬蔑诽谤是毛主义阴谋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其荒谬程度真是无以复加。甚至周恩来，虽然他在那时早已转到毛的立场上去了，对此也加以否认并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周恩来和朱德的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的印象是，一切军事问题都是由周恩来决定的。具体地说，浒湾战役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博古暗示说，朱德多年来已退居幕后，1929年毛独揽了军事领导大权，但是在1932年又不得不让权于周。我发现，在这里党内冲突正激烈进行，而我也就不再多问什么了。很久以后我又所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我想以后再谈。

我们对军事形势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认为，在陈诚将其主力集结到盱江以后，应当尽快停止浒湾战役，而在部分已被敌人夺去的东北一线发动新的攻击。为了履行义务，我叙述了实际上已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否定了的弗雷德的原先计划，即在赣江和盱江之间构筑防御工事，在东北部向敌人的后方推进。当然我也没有隐瞒我对这个计划所持的怀疑态度。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此外，我们也都认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住。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的主攻部队在对敌最容易而对我们最危险的道路上继续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并在盱江东西两岸保证自己部队发动突击时安全过江。这些决议也都报告了军事委员会，并且得到了批准。

我们在建宁逗留期间，从项英那里传来了一个消息：根据上海方面的无线电报，蔡廷锴正在策划反对蒋介石。估计蔡廷锴在政治上会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反对派政治家的支持，粤桂两省省主席至少会保持中立。按照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局的意见，我们应该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新产生的矛盾，给蒋介石以毁灭性的打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政治前提和军事细节，由于缺乏详细的情报，开始时我们没有讨论。博古认为，这些问题应在1934年1月所有领导同志会集瑞金时再进行讨论。项英来电话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则上也同意这个计划。

鉴于事态有了新的发展及我军主力又有可能重新部署于赣西北地区，前敌指挥部因此命令第一军团留在广昌地区，同时第三和第五军团（四个师）在黎川东南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分散兵力无疑不利于战事的结局，彭德怀的批评是正确的。

博古和我绕道回到了瑞金。在广昌地区我们察看了地形，我对掩体的构造作了一些指示，这些掩体应当伪装起来，使人不易发现而又能在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射击下进行防护，这样做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至今在这里和其他地方自发建造的带枪眼的半圆形工事，往往成为敌人火力的最好目标。

1934年1月，在瑞金附近召开了中共中央五中全会，接着月底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自从在第四次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得到更新、常务委员会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以后，已经过了整整三年。至于在统一过去存在的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不同见解，保证同毛泽东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追随者有效的合作方面，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绩，现在大概可以看得清楚了。

其实，这方面的条件是存在的。在忠实坚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的马列主义干部的领导下，甚至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闽赣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稳定了，军事力量巩固了。同1932年宁都的激烈冲突相比，在中央领导和多数受毛影响的地方和军队干部之间，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密切的关系。我从自己的所见所闻可以证明，博古作为党的总书记，当时尽了一切努力来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然而这种努力没有得到毛相应的回答。毛那时虽然或多或少又重新参与了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但在其他方面，在个人交往中，态度总是非常冷淡。中央全会预备期间，他借口身体状况不佳，声称不能参加会议，因而破坏了会议表面上的和谐。他对这次会议事实上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忿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从表面上看，人们也许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以为不存在什么重要的意见分歧。无论在中央全会中，还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毛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也同意了中央全会指示中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两次会议的发言和决议中，都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地接近毛观点的提法。由于我自己没有参加中央全会，我得到的消息也可能不够准确，下面我所依据的是1935年在莫斯科摘录出版并附有王明写的引言的正式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间接看到，至少中央全会给代表大会的指示是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商定的。

两个大会一致认为，中国革命是带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还强调指出，“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意思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道路上拯救出来。”指示中说，苏维埃政府真诚地希望，同一切反日和反帝的力量联合起来，为民族革命而共同斗争。但是接着却又指出，中国的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都已崩溃，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理论出发，于是就断定，只有以革命战争去消灭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先在一省或数省、最后在全中国取得全面胜利。为此，应该采取使各个苏区的军事行动严格一致的方针，以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占领中心城市。

由于中央苏区同中国其他地方的革命根据地和部队几乎都没有联系，所以在当时要协调中央苏区以外的一切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撇开这点不谈，这个目标也是从两个不切合当时实际的前提出发而提出的。第一，把国内一切非共产党和非苏维埃势力都毫无区别地笼统地称之为反动的一邦，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反对国民党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即内战，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写的：红军是抗日战争中唯一的武装力量，是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

最主要的杠杆。尤其是193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指示，在民族革命解放运动中，同国民党反对派集团利军队结成同盟是有可能的，上述看法就更使人觉得惊奇。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存在的，以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33年春，冯玉祥的崛起，同蔡廷锴谈判的恢复及继续，由于蔡廷锴的努力使谈判在1934年1月，即中央全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取得了成功。第二，认为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但是，在对形势作了冷静的判断，采取了以战役和战术进攻的方法达到战略防御目的的军事路线时，却又说革命虽然在发展，但正如毛泽东有时所讲的那样，仍然还处于“低潮”。毛片面地强调军事斗争的路线越来越得到贯彻，甚至达到了如此程度，竟要白区的政治工作首先服从游击队的领导，这说明他们对国民党地区地下党的群众政治工作是十分轻视的。

不可否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以后，王明在莫斯科所写的“引言”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在那里也说到中华苏维埃是一种特殊的新的国家形式，鉴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彻底崩溃，以及它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革命同反革命的长期流血斗争中，必须实行这种国家形式。在这方面王明还不厌其烦地说，已经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将进入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不久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他在“引言”中说，如果中国革命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取得胜利，就有可能引起世界革命的第二次高潮并阻止战争。但是，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先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罪恶战争，那末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就必须利用这场战争，来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并把远东的所有其他的民族从帝国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虽然王明在这里很清楚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国际主义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保卫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但是在这个“引言”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李立三和毛泽东关于中国是世界革命新中心的老调。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他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他肯定是被片面夸大的消息迷惑了。例如他在“引言”中说，中国已有六分之一的土地被苏维埃政权所控制。写到这里时，他颇为恰当地加了限制词，说这些地区都是分散的经济落后的农村。实际上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苏区面积总共还不到中国内地十八个省的百分之三，也就是在四百万平方公里中只占十二万、最多占十五万平方公里；而居民人口只占百分之二点五，与1932年相比，略有减少。由于当时第二军团和第四军团新开辟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所以其影响还是很严重的。有所增加的是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第四军团的武装力量。

此外，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所谓政治上分裂和军事上薄弱，以及关于红军人数的夸大之词，都是属于这类不实报道之列。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最短时间内创建一支拥有百万人数的军队，中央全会的指示也要求组织“新的方面军、新的师和新的军团”，但这种要求同实际的可能性是很不相符的。

在讲话和决议中，有些地方也显示了马列主义领导干部的影响，例如其中谈到了关于坚决同游击主义的传统做斗争、关于提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关于坚持包括同中农结

成牢固联盟的正确的阶级路线和重新分配没收来的土地、关于加强和巩固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权各级机构中的领导作用等问题。但无论是中央全会的指示还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没有谈到国际工人运动。关于苏联，除了在毛泽东报告的开头有几句空洞的词句外，在文件中也都没有提及。

会议文件，特别是中央全会的指示，内容常常前后不一，有些地方甚至互相矛盾。这说明人们所追求的只是达到一致通过的目的，而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另外还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同毛泽东的追随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力量的均势，但是也可以看出，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毛的观点开始作出了让步。两次会议几乎尚未结束，又发生了虽然在语言上是缓和的，但事实上是十分尖锐的冲突。据我所知，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纠正经济政策，进行战争的方法，以及同苏联的关系。

中央苏区的经济，不言而喻，当然只能是战时的经济，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但是，过去在贯彻经济政策过程中，是存在严重错误的。毛泽东推行一条非常强硬的“左倾”路线，这条路线不仅要消灭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而且还要消灭富农，有时甚至要消灭中农；其他的中间阶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遭到了严重损害。他把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或者没收征用，然后再按“人头”重新分配。在重新分配土地时，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往往被忽略不顾，人们就以“最后胜利”来宽慰他们。在成立合作社过程中，矛盾也很尖锐，行政上采取强制措施，急于求成，毫无选择的自由。

这些老错误是“左”倾宗派主义愚油的表现，或者说，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出于误解而采取过急行动的表现现在这些错误或多或少得到了清算。毛泽东，还有一直倾向于支持“左倾”路线的洛甫，这时来了一个急转弯。同以往一样，毛这一次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现在又主张政治上也对大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采取缓和政策，主张给私人投资和商业以更大的活动余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活动余地”这几个字，因为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对此也是赞成的。也许毛想到的是在中国实行一种类似1921年在苏联代替了军事共产主义的那种新经济政策，以为在被封锁的条件下，经济形势可以因此有所好转，苏维埃政府的社会基础也可以得到扩大。与此相联系，他还以“一切为农民”这句口号，来补充“一切为了前线”这句正确的口号，他相当明确地主张采取由他推行了多年的面向农民的路线，更精确地说是面向农村居民的路线，进而冲淡了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原则。这样，尽管没有明白地表达出来，但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阶级路线问题。

至于进行战争的方法，内部的争论是：在正规战术和非正规战术、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之间，重点应放在哪一方面。其实，从1931到1932年改编革命军以来，就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毛依据1927年以后的所谓“胜利实践”，主张完全采取游击战的老方法，而不考虑这样做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土地；同时还低估了第五次“围剿”中敌人的“堡垒战术”。他的这些观点不仅遭到中央领导人的反对，甚至他的一些追随者也不同意。我记得，项英为此来找过我，要求我起草《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中央全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政治观点的干涉，这是不允许的。但